

# 不理性的平衡？ —重新審視美國在 1995-96 年間 台海危機的軍事干預行為\*

徐子軒\*\*

- 一、前言
- 二、傳統理性理論的反思
- 三、基於人性的冒險-風險平衡理論
- 四、個案研究：1995-96 年台海危機
- 五、結論

目前學界對於 1995-96 年間台海危機的研究，均是立基於所謂的預期效用理論（expected utility theory）上，也就是假設國家是理性行為者，其目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然而，台灣對於美中兩國的利益顯然不對稱，美國在台海危機中實施軍事干預絕非利益最大化的表現。此外，預期效用理論乃是針對長時間一般決策過程的歸納，而在短暫的危機決策過程中有其解釋不足之處。為此，新古典現實主義者戴傑飛（Jeffrey W. Taliaferro）提出了風險平衡（balance of risk）理論，試圖解釋何以強權會在邊陲地帶

---

\* 筆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先進的細心指正，亦要感謝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諸位師長的教導，當然，本文文責由筆者自負。

\*\*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生。E-mail：lucian@anet.net.tw

投稿日期：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接受刊登日期：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三日。

東吳政治學報/2009/第二十七卷第一期/頁 155-198。

進行具風險性的軍事及外交干預，而這些邊陲地帶通常都不涉及強權的核心利益，顯示出強權的行為並非完全依照理性原則，故此，本研究便以風險平衡理論來檢視美國在 1995-96 年間的軍事干預行為，冀能提供較為完整的解釋。

**關鍵詞：**風險平衡、美中關係、展望理論、預期效用理論、新古典現實主義

## 一、前言

1995-96 年間的台海危機是 20 世紀第三次在台灣海峽出現的緊張狀態（學界亦有將 1962 年的國光計畫視為第三次台海危機，本文則不將此列入），它除了是兩個核武大國在冷戰後的首次衝突，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對外所展現最大規模的軍事演習。這次美中之間的衝突，有許多面向值得觀察，最重要者莫過於：本次危機之後，在亞太地區充斥著一股中國威脅論的聲浪，各國並非只關注在中國對台灣的軍事演習上，也不只是擔憂中國全然不顧國際建制或是世界輿論的壓力，而是在於中國直接挑戰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權威，亦即試圖破壞了本地區的權力平衡，這讓更讓人質疑中國乃是一個『特別』的修正主義國家（Johnston, 2003: 6, 27），迫使中國在危機過後開始修正其大戰略方向，進一步延伸出日後的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Goldstein, 2005: 47-48, 179-180）。

自從韓戰之後美國就瞭解到縱使中國佔有台灣，對美國的安全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換言之，台灣對美國僅有少部分在地緣戰略上的意義，例如台灣海峽與南海航道的通行，除此之外，美國仍可以從太平洋上的其他基地以及睥睨全球的航母艦隊投射其武力；但對中國來說，台灣不僅是安全上的考量，亦是民族主義上不可失去之重，中國固無法容忍台灣為敵國控制或與敵國結盟，更不能坐看失去台灣而鼓勵其他分離主義的興起，如此台灣相對於美國較之相對於中國的利益，顯然是不對稱的（Ross, 2002: 54-56），那麼美國

又何以冒著軍事衝突的風險，不顧中國的核訛詐，<sup>1</sup> 強行介入 1995-1996 年間的台海危機呢？

就目的而言，中國的選項很簡單，軍事演習與飛彈外交就是要影響台灣的立委與總統選舉，其終極目標無他，即是預防台灣獨立與美國可能的協助（Fravel, 2007/08: 65-66），另外，亦隱含追求國際地位提昇的可能性（蔡榮祥，2007：208-213）。但美國的目的顯然不是那樣簡單，不能只從單一面向進行解釋，包括的因素可能有台灣的民主化、美國對亞太盟國的安全承諾、隨之而來的多米諾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權力平衡（Kang, 2007: 93-94），以及做為超強而欲掌控的世界秩序等（Sutter, 2005: 7, 30, 68），這些因素基本上都與中國的思維與立場背道而馳，亦即，中國對美國的全球戰略構成了潛在的威脅。

甫上任的柯林頓政府在對中政策上曾嘗試制定出一套所謂的美國政策，以整合府、會及官僚系統等各方的意見，但到了 1994 年，柯林頓政府對於中國的態度丕變，放棄人權與最惠國待遇的掛勾政策，升級為全面交往（comprehensive engagement），更在 1995-96 年的台海危機過後，迅速與中國修補關係，成為建設性的戰略伙伴（construct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林正義，2002：2-12）。林林總總正顯示了美國在做決策時所面臨到的各種複雜情勢，若要有一個通盤的考量，其實非常困難，尤其在民選政府制度下，決策者往往遭遇到太多變數干擾，更無法在有限時間內，對於危機做出妥善的處理。因此，以傳統的分析模型並不足以解釋強權對外的干預行

---

1. 中國解放軍將領曾對前美國助理國防部長傅立民（Charles Freeman）表示：美國無法嚇阻中國對台灣使用武力，因為中國已是個核武國家，他相信美國的決策者關心洛杉磯的安危遠勝於台灣。參見 Tyler（1996）。

為，本文將採用新古典現實主義者戴傑飛（Jeffrey W. Taliaferro）所提出的風險平衡（balance of risk）理論，針對 1995-96 年間的台海危機，以有別於傳統的分析途徑來解釋美國出兵的原因。

## 二、傳統理性理論的反思

目前對於 1995-96 年台海危機美國決策的分析，有從個人、官僚及國內等面向著手（Suettinger, 2006: 276-287）、有專注於決策小組（decision-making unit）對台海局勢的政策制定（陳文賢，2002）、有檢討美中台三方領導人的決策失誤（裘兆琳，1998）、有從國際到國內再到個人層次，再輔以歷史與法律因素分析（邵玉銘等，1999），亦有利用艾里遜（Allison, 1971）的模型進行解釋（陳一新，2000；王公龍，2005）。平實而論，各家的分析架構大同小異，不脫離傳統理性理論的研究途徑，較有系統而具代表性的當屬艾里遜提出的分析模型，下文將針對他的模型進行檢討。

艾里遜的三個模型由於開發甚早，許多假設並未完備，究其根本，仍是在於當年學術界對於人類理性行為認知的缺乏，以及學科之間緩慢的相互交流性所致。艾里遜的理性行為者模型是一種單一時段（single time period）的導向，亦即理性行為者只會在危機發生的當下估算選項，並付諸實行以待問題解決，他認為這是理性模型的限制，稱之為靜態的選擇（static selection）。事實上，由於選項多樣化的分歧，橫跨的時段不會只限於一時，所以決策應該是屬於多時段（multiple time period）的導向（Bendor and Hammond, 1992: 304-309），艾里遜只從古巴危機的單一時段得出一些觀察，而認為這就是所有實際決策的情況，殊不知危機時的決策特性，與平時的

政策制定過程存有很大的差異（威廉紐曼，2007: 51-52）。

美國對台灣的政策長久在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中擺盪（Tucker, 2005: ch.8；林正義，2007），這種不確定性正是理性模型的致命傷。1995-96 年的台海危機中，時任國防部助理部長的奈伊（Joseph S. Nye）針對一觸即發的局勢表示「沒人知道屆時我們會怎麼反應」（Lin, 1996: 20）。一般認為若台灣在未挑釁的情況下遭到攻擊，美國就會協防台灣，但對於挑釁行為的定義則莫衷一是，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即表示「我們還沒研究出該如何操作挑釁的定義」，<sup>2</sup> 這些觀點說明了以艾里遜理性行為者分析模型解釋力的不足，<sup>3</sup> 儘管他並未如Bueno de Mesquita（1981, 1988）般明確地以經濟學中預期效用理論（expected utility theory）的數理模型來解釋國際衝突，但他仍引進所謂主觀預期效用（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的變數做為其模型的核心，<sup>4</sup> 注意到不確定性對於決策的影

---

2. 此為 2004 年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之「中國崛起之再省思:現實與認知」研討會中，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在圓桌討論上的談話，參見袁易等編（2004: 249）。

3. 在與哲利考（Philip Zelikow）合著的 *Essence of Decision* 第二版中，艾里遜對理性行為者的模型進行了修正，他先是引進賽蒙（Herbert Simon）關於有限理性的概念，決策者不太可能得到完全理性模式下的最佳解，而只能求得滿意解，將所謂的「理性模式」（Rational Model）更改為「理性行為者模式」（Rational Actor Model），讓此模型較為符合當時的學術共識。參見 Allison and Zelikow（1999: 20-22）。此外，他們也將「組織程序模式」（Organizational Process Model）修正為「組織行為模式」（Organizational Behavior Model）；「官僚政治模式」（Bureaucratic Politics Model）修正為「政府政治模式」（Governmental Politics Model）。但無論是組織中的外事決策者們，或是政府（官僚）成員的討價還價，相較於個人理性行為者模型，差別亦只是在於前兩者追尋的是相對利益極大化，而後者則是絕對利益極大化，仍舊脫離不了預期效用理論的範疇。

4. 主觀預期效用理論認為不同決策者對於同樣事件有不同的機率判斷，事件發生機率雖不確定，但在決策判斷過程，決策者會賦予每個可能發生之情境一組已知的主觀機率（不必然等於客觀機率）。參見 Savage（1954; 1972）。

響，以補充模型的完整。事實上這兩者都認為人的決策要同時考慮獲利的多寡和獲利的機率，決策者會選擇二者乘積值大的方案，只不過前者考慮的是客觀機率，預先假定被人們選定的方案一定是具備了某種最大值的方案，而後者強調主觀機率，試圖證明被選中的方案是具備了主觀上的最大值（Allison and Zelikow, 1999: 23, 46-47）。但無論何者，均無法脫出這套理論的基本假設，因為此領域中的研究者總是從預測失敗中認定最大化的標準出了差錯，於是盡力修改不符實際最大化標準，而少有人質疑有問題的正是最大化原則本身（Hartley and Farrell, 2002: 613-624）。

在Allais悖論（Allais paradox）提出後，預期效用理論遇到無法解釋的窘境：即使有相等的期待效用，但人們仍偏好於更具確定性的選擇方案，此實證現象推翻了期望效用理論所賴以存在的替代定理，他證明了相對於確定獲得的結果，人們會低估可能的結果。Allais不僅挑戰了預期效用理論的框架，更挑戰了經濟學理論中經濟人的基本假設，所有關於人類決策的模型都必須要回答他的問題，如上所述，有許多預期效用理論的分支均試圖進行修正，但仍無法解釋個人在風險承受（risk acceptance）與風險趨避（risk aversion）的取向。<sup>5</sup> 此乃肇因於人們在做決策時，並不是如傳統理論假設的理性，

---

5. 法國經濟學家Maurice Allais在 1952 年提出他著名的實驗：測試 100 個人在賭局中的抉擇：賭局A：100%的機會得到 100 萬元。賭局B：10%的機會得到 500 萬元，89%的機會得到 100 萬元，1%的機會什麼都得不到。實驗結果顯示，絕大多數人選擇A而不是B。接著Allais設計了另一個賭局對這些人繼續進行測試：賭局C：11%的機會得到 100 萬元，89%的機會什麼都得不到。賭局D：10%的機會得到 500 萬元，90%的機會什麼都得不到。實驗結果則顯示，絕大多數人選擇D而非C。按照預期效用理論，風險趨避者應該選擇A和C；風險承受者應該選擇B和D，但實驗中的大多數人卻選擇了A和D。展望理論則對此提供了解釋：面對A和B時，個人參考點是 0，因此處於獲利狀況下，個人表現為風險趨避，會選擇A；面對C和D，個人參考點同樣

會對所有的情境及可能性做詳盡的分析，往往不能充份瞭解到自己所面對的狀況，便會出現所謂的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遂常以經驗法則或直覺作為決策的依據，因而就會有過度反應或反應不足的現象（Shiller, 1979: 1190-1219; Cutler et al., 1991: 529-546）。或是個人在做選擇的時候，常常會受到問題描述方式的影響而有不同的選擇，<sup>6</sup> 這些現象都抵觸了預期效用理論的公設，而展望理論則對此提出了解答。

展望理論並不否認個人極大化效用，但認為函數是非線性的，也就是個人在不確定狀況下的決策行為，考慮的是獲利與損失的價值函數（value function），而非效用極大化的效用函數（utility function），因為價值函數是用來反映後果（即展望）的主觀感受值，以衡量展望相對於參考點偏差的價值，代替了直接後果或傳統的效用函數。預期效用理論的模型顯示個人對於事物的偏好順序（preference ordering）是固定的，這就與展望理論主張個人偏好順序是多樣化的大相逕庭。簡言之，以預期效用理論看待衝突與戰爭行為，會得到如此推論：衝突與戰爭均是蓄意與計算過後而發動的行為，若決策者認為有利可圖（即得到預期效用）才會發動，若決策者認為和平或投降的利益高於戰爭的整體結果，則不會發動，或是停止已經發動的戰爭，但這顯然與真實世界的經驗有些差距

---

為0，也是處於獲利狀況下，但由於機率較低，轉化為權重函數時，D的效用要大於C的效用，個人表現則為風險承受。參見Allais（2008）。

6. 此即所謂的框架依賴（frame independence），個人會因為情境和問題的陳述與表達不同而有不同的選擇。展望理論中提到，個人根據自身參考點來做決策就是框架相依的現象，而框架依賴偏誤是指決策者的判斷與選擇會受到決策問題呈現方式的影響，以致未能做出最佳抉擇，當決策者的評估因框架不同而出現差異，導致未能洞察事件真相，即是所謂的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參見Mercer（2005: 1-21）；Levy（1992: 285-289）。



（ Jervis, 1992: 192-197; Berejikian, 2004: 22-26; Cashman and Robinson, 2007: 6-8 ） ， 並不能解釋許多歷史上的案例。

換言之，這種預期效用心理是用以描述理性行為的特性，並非用以描述實際的行為（這是展望理論的範疇），事實上，預期效用理論的假設使其對於個人實際決策行為解釋有限，但理性是人類決策的基本取向，就長期而言，人類行為仍是符合理性假定的，需注意的是，僅僅關注長期決策行為結果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我們生活在現在，隨時都會面對一觸即發的危機。而展望理論把心理學和經濟學有效地結合起來，分析現實中個人的理性與不理性，揭示了在面臨風險和不確定條件下個人實際的決策機制，研究者必須瞭解現實生活是非常複雜的，因此更需要一個立基於個人行為的決策理論（Tversky and Kahneman, 1986: 271-272）。

政治學界在解釋決策行為時，已經注意到人類的行為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主張決策者受限本身經驗與取得資訊之不易，通常僅能就其所知的情境下，做最佳的決策。但經濟學界卻從許多實證研究與生活經驗指出，在不確定性情況下，人類的決策制定行為，與傳統預期效用理論所預測的行為之間存在著系統性偏差，換言之，有時人類的行為根本是不理性的！因此，我們必須重新檢視過去對於決策行為的解釋模型，重新思考理論與現實的契合度，以下將介紹風險平衡理論，做為研究國家決策的新概念。

### 三、基於人性的冒險-風險平衡理論

新古典現實主義學者戴傑飛針對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理論進行修正，並結合了經濟學領域中蓬勃發展的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或譯前景理論），<sup>7</sup> 提出一個新的研究方向，稱之為風險平衡（balance of risk）理論。就戴傑飛的風險平衡理論觀之，修正後的守勢現實主義是其理論的假設前提，<sup>8</sup> 他試圖以這種視角理解世界政治與國際關係，再以展望理論作為研究方法的架構，透過對國家行為者在某些時間點上發生的事件，與相對應的行為做出分析及判斷，以解釋他在《*Balancing Risks*》一書中所提出的兩個核心問題：一、強權何以在邊陲地區進行具有風險的外交或軍事干預？二、即使勝利遙遙無期，在政治、軍事與經濟上的成本又節節高昇，強權為何仍持續堅持投入邊陲地區的衝突中（Taliaferro, 2004: 2）？

在解釋這兩個問題之前，必須先行瞭解所謂風險平衡理論的內

---

7. Tversky 與 Kahneman 在 1979 年對主宰經濟學界數十年的預期效用理論（expected utility theory）提出批判與嶄新的研究方向。他們指出：(1) 人在不確定情況下的決策行為其實是相對的概念。(2) 有時候個人會喜歡追逐風險，有時則會迴避風險。(3) 一般人不喜歡風險。參見 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 263-291)。

8. 戴傑飛以修正後之守勢現實主義作為其理論基礎，在他之前亦有類似研究，最重要者莫過於史耐德（Jack Snyder）在 *Myths of Empire* 一書中所提出之帝國主義中國內聯合壟斷團體（cartel）的互助理論（logrolling theory of imperialism），亦是對於結構現實主義的修正，但他認為史耐德的理論太過於重視國內因素，而將國際因素排除，讓他的理論在解釋上有很大的漏洞，而在國內部分，太過注重利益團體（cartel）的力量，也未能完全代表決策階層，對於他所提出的兩個問題無法完整解釋，因此戴傑飛以有別於結構現實主義之雙本體論進行研究，在前人的基礎上強調國內因素與國際因素並重，可將其歸類於新古典現實主義學派。

涵。首先，戴傑飛比較了守勢現實主義與攻勢現實主義的差異，現實主義的公設是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總會製造出強烈的安全競爭，在這種前提下，前者認為無政府狀態會促使國家極大化安全，而後者則認為無政府狀態會促使國家極大化相對權力，因此產生出不同的戰略，採取守勢現實主義觀點的決策者，其戰略是較強硬的（hard-line），而採取攻勢現實主義觀點的決策者，其戰略則是較為寬鬆的（accommodative）。<sup>9</sup> 然而，若根據攻勢現實主義權力極大化的邏輯，國家應該隨時準備削弱潛在對手力量與增進本身相對實力，如此干預（甚至侵略）有時是最好的方法，則強權會對邊陲地區進行外交或軍事上的干預產生濃厚的興趣，而基於理性選擇，強權面對當地有利於己或權力真空的狀態下，會選擇風險承受的策略（積極介入），如當地環境不利於己，則會選擇風險趨避的策略（退出，或消極迴避）（Taliaferro, 2004: 11-14），但這樣的因果關係顯然無法解釋有些強權為何會違背理性原則，不顧自身的大量傷亡，而繼續投入衝突。

另一方面，戴傑飛針對守勢現實主義也提出了一些批評，他認為守勢現實主義在國家間的安全困境或戰爭發生的原因上，太過於重視國際結構的因素，像是多極體系的不穩定、攻守失衡而倒向攻擊的面向、威脅平衡的力量改變與地緣比鄰等，如此傾向國際無政府本質的解釋，早已遭致所謂的「現狀偏好」（status quo bias），

---

9. 關於守勢現實主義與攻勢現實主義的辯論，國內外已有大量文獻可供參考，並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戴傑飛更將新現實主義、新古典現實主義、守勢現實主義與攻勢現實主義四種現實主義以 2×2 的矩陣進行分類，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分類可視為是一種連續性的光譜（continuum），便於理解現實主義的研究方向，並非具體的分別。參見 Taliaferro（2000/01: 134-143）。

而這種現狀偏好會導致所謂原賦效果 (endowment effect)<sup>10</sup>，使國家厭惡損失 (loss aversion) 已有之物 (Levy, 2003: 216-219)，自然會傾向於維持現狀。究其根本，這種偏好應源於領導者在處理所接收到的各種資訊，諸如國際環境及國家相對地位的改變等，不能僅歸於國際無政府的狀態上 (林民旺，2007：123-124)。

正因如此，戴傑飛引進展望理論作為分析的架構，他試圖將國家視為一行為者，觀察它在特定時間點上面臨特定事件所做出的反應，以判斷其行為屬於趨避風險抑或承受風險，這有別於目前大部分的研究多聚焦於決策者個人的政策上，如 Farnham (1992)、Haas (2001) 及 Kanner (2004) 等。展望理論認為，在不確定的條件下，人們的決策過程可分為編輯 (editing) 和評價 (evaluation) 兩個階段，所謂編輯階段是指對不同的結果進行初步分析，其目的是找出簡化的表現形式，以使決策變的更加容易，亦稱之為制訂 (framing) 階段。編輯階段一般被分為編碼 (coding)、合併 (combination)、分解 (segregation) 與刪除 (cancellation) 四個環境；評價階段則是對編輯之後的結果進行價值評判，以便進行最後的選擇，亦即選擇最高價值的展望 (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 274-276; McDermott, 1998: 20-27)。

在編輯階段最為重要的概念，即是所謂的參考點 (reference point)。展望理論的創始人 Kahneman 與 Tversky (1979) 發現，決

---

10. 原賦效果 (endowment effect) 是由於厭惡損失所產生的效應，比如人們對於賣出一樣物品所要求的價格，會比要買入此物所願意付的價格較高。換言之，人們一旦擁有了一項物品 (即原賦)，就會賦予此物品較高的價值，儘管人們未必需要此一物品，並不是他們高估了所擁有物品的吸引力，而是放棄自己所擁有的物品所引起的痛苦，對人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參見 De Bondt and Thaler (1985: 793-805)；Kahneman et al. (1991: 193-206)。

策者在選項之前總是有意或無意地對結果進行推測，這種推測所獲得的結果就是參考點。在特定事件進行中，決策者所獲得的價值會受這個參考點的影響，而不是簡單地由絕對財富的變化來決定。換言之，如果結果A優於參考點的價值，那麼對於決策者而言就是一種獲利，差距越大，決策者所獲得的價值（正效用）也越高；反之如果結果A劣於參考點的價值，則對決策者來說就是一種損失，那怕事實上決策者仍是獲利的狀態。同理，這種差距越大，負效用也就越大。決策參考點可以是現狀，也可能是某種期望水準（expectation levels），事實上他們的研究發現，很多決策者所依賴的參考點並不是當時的現狀，而是預期想達到的水準（Taliaferro, 2004: 37-39），這也與戴傑飛研究的兩個案例（1905年德國決意引起摩洛哥危機、1940-41年間日本對美開戰之決策）大致相符，決策者們的參考點幾乎都是期望的水準，因此往往有認知失調，即未能達到他們預設的期望，故採取了承受風險的大膽行為。<sup>11</sup>

綜上所言，風險平衡理論有四點假定：第一，國際體系（即無政府狀態、國家間相對權力分佈）限制了國際格局和國家外交政策的範圍；第二，如同其他守勢現實主義理論，戴傑飛也認為只有在少數情況下，國際體系才會提供國家衝突與侵略的動機；第三，體系規則（systemic imperative）與國家領導者的外交決策之間有著複雜但非直接的連結，欲瞭解一國採行的政策，必先探究其高級官員對於國家間相對權力與國際環境如何評價；最後，人類處理關於自身環境資訊的能力是有限的，他們通常依賴先天的信念系統（belief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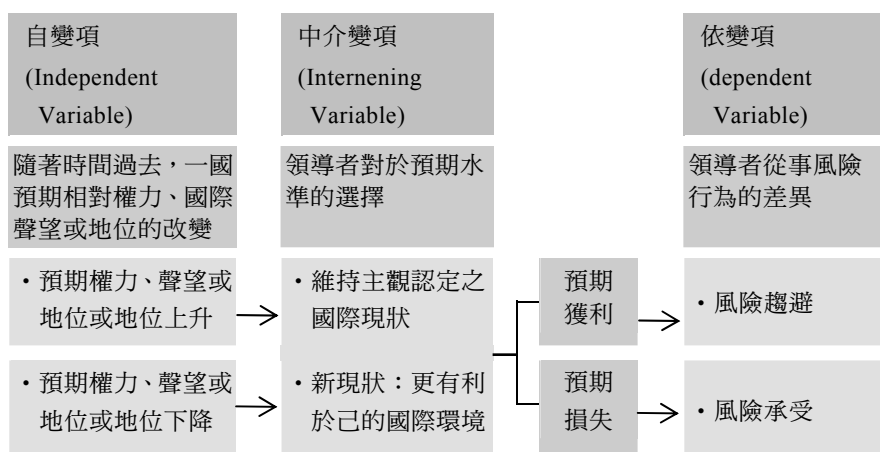
11. 但在戴傑飛研究 1950-51 年間美國發動韓戰的案例中，他發現美國決策者採取的參考點多以現狀為主，採取的行為自然屬於趨避風險，這也符合展望理論的假設。參考點是現狀或期望水準並不影響理論的可靠性，但卻添增研究的變數，使得國家的行為更難預測。

system) 與認知捷徑 (cognitive short cuts) 來估算權力與選擇政策，換言之，人們的決策行為雖然是理性的，但是會受到某種限制，即有限理性。

在這四個假定下，戴傑飛提出風險平衡理論的因果邏輯：決策者在確定獲利的情境下傾向於風險趨避；在認知損失的情境下，則傾向於風險承受的不理性行為（見圖一），以此可以推論，強國之所以在邊陲地區進行具有風險的外交或軍事干預行為，乃是為了避免認知到的損失，這種損失可能是有形的物質權力，亦可能是無形的聲望地位；可能是保護該強國在當地的既得利益，亦可能是追趕對手國的先馳得點，至此戴傑飛回答了先前提出的第一個問題。而當情勢渾沌不明、雙方陷入僵局，甚至對手國已取得優勢、己方已呈劣勢之時，該強國反而有可能更進一步的投入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從事更具風險的行為（甚或是看來成功機率渺茫的行為），期望能夠以此挽回沈沒成本 (sunk cost) (Taliaferro, 2004: 33-35; McDermott, 2004: 300-301)，<sup>12</sup> 這也就是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在下一部分中，本文將以風險平衡理論的研究架構，分析 1995-96 年台海危機中美國的行為，並找出判斷美國海外軍事干預的依據，以做為未來政策制定者的參考。

---

12. 關於沈沒成本 (sunk cost)，是指人在做決策前會將先前投入的成本（無論有形或無形）納入考量，這是由於個人不願意接受先前之投入已浪費掉的事實，因此會將沈沒成本納入決策考量中，顯示人們有一種過度依戀於消耗資源行動的傾向，人們投入越大則套牢越大，故又被稱為套牢成本或沈溺成本。參見 Arkes and Blumer (1985)；Schaubroeck and Davis (1994)。



圖一 風險平衡理論的因果邏輯<sup>13</sup>

資料來源：Taliaferro (2004: 41)。

## 四、案例分析：1995-96 年台海危機

在 1995 年台海危機之前，柯林頓政府當時正為其他外事所苦，如波士尼亞、海地、索馬利亞等，對於中國的關注大多在最惠國待遇與人權議題上，並不認為在核發李登輝簽證一事上，中國會採取激烈的行動，這個判斷導致中國召回駐美大使述職，並在同意美國駐華大使人選上延宕甚久，出現了雙方自 1979 年關係正常化以來首次外交管道中斷的狀態，更讓中國展開日後一連串的軍演，進而影響到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下文根據中國軍演的目的，以及美國的回應，將之區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 1995 年 7-9 月，本階段

13. 本圖與 Taliaferro (2004) 書中有些許出入，原書在依變項內容為「預期權力、聲望或地位上升」以及「預期權力上升、聲望或地位下降」，顯是誤植，在筆者與 Taliaferro 之 Email 中已指出此點錯誤，故在本圖中將依變項內容改為「風險趨避」與「風險承受」。

中國主要的目的在於對美國核發李登輝簽證做出抗議，美國在這階段選擇溫和回應；第二階段為 1995 年 10-12 月，本階段中國主要的目的在於以更大規模的軍演對美國釋放出政治信號，並影響台灣的國會選舉，而美國的回應漸趨強硬；第三階段為 1996 年 2-3 月，本階段中國主要的目的在於以導彈交叉射擊台灣南北兩端的海域，試圖影響總統大選，也趁機測試美國的底線，而美國則被迫以兩艘核母戰鬥群強烈回應。

## （一）1995 年 7-9 月

### 1. 背景

1995 年 7 月 21 日至 28 日，中國了舉行代號為藍鯨五號（Blue Whale 5）的軍事演習，地點在北緯 26 度 22 分、東京 122 度 10 分的十溼海域內進行，約在台北北方九十哩偏東處進行導彈試射訓練，這期間中國共發射六枚地對地導彈，全部都是東風十五型的短程飛彈，顯示解放軍在立體化攻擊上的實力，用意是摧毀假想敵的作戰指揮中心。同時派出海、空軍在目標區附近進行巡邏與監視，這是中國歷來試射飛彈目標首次最靠近台灣的一次。新華社又在該年 8 月 10 日宣布在 8 月 15 至 25 日舉行導彈試射與砲擊演習，演習區是在上次彈著區附近的梯形水域。此次演習主要係以海軍為主，亦發射了六枚導彈，主要項目是海面對抗（費學禮，1999：206-208；Garver, 1997: 74; Whiting, 2001: 121）。



## 2. 分析

對於中國在 7 月 21 日至 28 日舉行的第一次導彈試射演習，美國以相當溫和的態度與言論回應，顯然試圖安撫中國，不願讓事端升級。時任國務卿的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於 7 月 28 日在華府全國記者俱樂部所發表的外交政策演說中，反覆申明美國將信守與中國間的三項公報，無意改變一個中國政策，因此美國不會支持台灣進入聯合國，也不會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更表示不能讓短期的考慮轉移美國與中國的長遠利益。8 月 1 日，克里斯多福與錢其琛在汶萊進行會談，克里斯多福要求北京停止在東海的軍事演習，否則美國政府會因為國會介入外交決策而增加雙方關係恢復的變數，並在國會壓力下出售先進武器給台灣，使雙方關係出現更大裂痕。錢其琛則提出要求，除非華府作出不再讓李登輝訪美的承諾，否則北京不會停止導彈演習。據信克里斯多福在此遞交一份柯林頓給江澤民的信函，美國在信中首度表示歡迎江澤民到華府訪問，此外信中更對中國提出一些承諾，包括反對或抗拒台灣獨立、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這些承諾就是日後柯林頓訪華時的新三不政策的雛形，錢其琛表示中國重視美國的這些承諾，但他仍感到困惑的是美國不願承諾將來不再讓李登輝訪美（孟捷慕，1999：488-489；容安瀾，2007：130-32）。

如此顯見中國對於汶萊會議的結論並不全然滿意，仍要求美國就李登輝簽證一事做出錯誤的糾正。該年 8 月 24 日，美國國務次卿塔諾夫（Peter Tarnoff），前往上海與北京訪問，由於此時雙方尚未互派新任大使，外交管道的聯繫受阻，塔諾夫此行的目的是要傳達訊息，希望能促成柯江在 10 月舉行高峰會。他先與外交部副部長李肇星進行雙方副外長級磋商，再與外長錢其琛會面，談話中塔諾夫

再度重申美國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反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的立場。錢其琛表示，北京不希望今後發生類似李登輝簽證的事件，塔諾夫則泛泛回應，仍不願就台灣領導人未來是否仍能訪美做出承諾。但在美國繼續釋出善意之下，中國態度出現和緩的跡象，重新派遣大使李道豫前往華府，更命時任廣州軍區司令李希林前往火奴魯魯（Honolulu）參與二次大戰終戰五十年的慶祝儀式（林正義，1998：125；Ross, 2000: 97-99; Thies and Bratton, 2004: 564-566）。

在此可以建立一個參考點：美國雖已私下對中國提出新三不的承諾，這承諾相較於以往的對台政策顯得更為嚴苛，卻不肯在台灣領導人訪美一事上鬆口，這並非是要預留未來的空間給台灣，而是顯示美國在思考與執行政策上並不願讓中國予取予求，美國盼望的是與中國交往，但這交往的前提是在美國所掌控的國際秩序與美國霸權的制約下，因此這邊的參考點可以表示為「美國定義下的兩岸現狀」，這現狀不是美中台三方默契下定義的現狀，而是美國在發放簽證給李登輝之後所建立的新現狀，因為在某種程度上，美國覺得中國與台灣都試著偏離當時美國認可的現狀：中國以逐漸上升的國力為後盾，試圖主導兩岸關係，並排除美國對台灣的影响，台灣則是透過民主化的成果與經貿實力，試圖降低美國對台灣的牽制，進而改變兩岸關係的一中前提，亦即中台雙方各自採取對己有利的情勢，故此，美國希望重新控制對於現狀的解釋權（藍普頓，2003：34-39）。

換言之，美國定義的現狀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是從當時美中台的現狀逐漸過渡到美國領導者期望水準的過程，這個現狀乃是從1994年柯林頓政府執行對台政策檢討後建立起來的，對於美中台三

方而言都仍在摸索與適應，直到 1995 年給予李登輝簽證後，中國開始強烈反對這個現狀，因此美國必須做出調整及回應，在期望的水準下，藉著操弄台灣牌，柯林頓政府在國內外政治上都取得了成果，不僅不必動用否決權，與國會直接對立，造成府會緊張，進而影響柯林頓在 1996 年的大選（邵培德，2000：24），在對外事務上，柯林頓政府更使中國停止對伊朗出售核子反應爐（裘兆琳，1998：112-116）。

由於柯林頓政府認為中國能夠理解美國何以給予李登輝簽證，並沒有改變在三公報前提下制定的對台政策，因此在應付中國外交抗議的態度上顯得敷衍，對於中國在 7、8 月間的軍演更是輕描淡寫，僅僅強調美國並未從傳統的一中政策中後退，遂逼迫中國接受美國對待台灣的新態度，這不只是因為美國作為超強，足以恣意改變國際秩序，更是在天安門事件後，美國對於中國的不耐與厭惡。<sup>14</sup> 總的來說，美國定義的現狀（一個尚未完全形成的期望水準）在美中台三邊事務上是獲利的狀態，因此傾向於風險趨避的狀態，對於中國的抗議與軍演選擇了息事寧人的政策。<sup>15</sup>

---

<sup>14</sup> 柯林頓曾經表示：「中國要求我們尊重他們，他們也必須尊重我們！...我們對李登輝到訪的價值觀，已經反映在國會以壓倒性票數的表決結果上。」國家安全顧問雷克（Anthony Lake）也就簽證一事態度堅決，表示：「在做決定時，絕不能讓中國輾壓我們，或讓北京的敏感完全主宰我們的決定。」參見孟捷慕（1999，479-480）。

<sup>15</sup> 柯林頓政府在 1995 年 7 月 19 日，對軍事演習的第一次回應是：「對這些演習發表任何正面或負面的評論，都是不智，而且不適當的。」此外助理國務卿羅德（Winston Lord）在 7 月 25 日發表聲明：飛彈試射並沒有「促進海峽間的穩定」。在在都顯示美國並不想以強硬的態度看待中國的軍演，而將其視為是一般性的演練，或可宣洩中國國內對台灣及美國的不滿。參見費學禮（1999：217）。

表一 美國的參考點及其行動 1995 年 7-9 月

觀察期	參考點 (領導者評 估的結果)	相對於參考點 的預期結果	領導者的 風險傾向	政策選擇
1995 年 7 月 21-23 日中國向彭佳嶼附近海域發射 6 枚東風 15 型，計 4 枚短程、2 枚中程，均為可移動且具有裝載核彈能力之飛彈	美國定義下的兩岸現狀	獲利	風險趨避	溫和回應
1995 年 8 月 15-26 日中國向馬祖東北方海域進行第二次導彈試射	美國定義下的兩岸現狀	獲利	風險趨避	推動高層互訪，準備安撫中國情緒。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 (二) 1995 年 10-12 月

### 1. 背景

在台海議題上，中國得不到期待的回應（第四公報？），因而展開了下一階段的軍演，繼續測試美國的底線與意圖。1995 年十月中旬，中國海軍在黃海海域舉行多兵種的演習，包括了驅逐艦、護衛艦與陸戰等部隊，演訓項目包括艦機協同、潛艦對抗、登陸作戰等，主要用意在於展現中國艦艇編隊作戰的實戰能力，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更特別前往校閱，顯示極為重視海軍。該年 11 月 15 至 25 日，中國在福建沿海地區東山島舉行三軍聯合登陸作戰演習，主要目的是要影響台灣在 12 月舉行的國會選舉，動用官兵超過 16 萬人、200 艘登陸艇以及其他艦艇 100 艘，用意在於佔領台灣。需注意的是中國中央軍委在 10 月成立了「對台軍事指揮部」，指揮官由

中共軍委副主席張萬年出任，同時宣布演習地區是屬於「南京戰區」，對原本的南京軍區做了組織升級，以提升聯合作戰能力，強化武嚇的效果（費學禮，1999：208-209；Garver, 1997: 92-93; Whiting, 2001: 121）。

## 2. 分析

為了讓美中關係得以回復正常，極有必要推動雙方領導人的高峰會。1995 年 9 月 28 日，克里斯多福和錢其琛在出席聯合國大會時再度展開會談，雙方並表示關於柯江高峰會的進行，將繼續由雙方副外長進行磋商，亟欲促成美中最高層級的對話。10 月 18 日，江澤民在北京接見到訪的美國商務部長布朗（Ron Brown）時亦表示期待與柯林頓會面，兩國領導人保持接觸，有助於增進彼此瞭解，布朗也認為隨即而來的柯江高峰會可以修補雙方關係（林正義，2001：238）。

該年 10 月 24 日，柯林頓和江澤民在紐約聯合國 50 週年紀念會上見面，進行雙方關係緊繃以來的首次高峰會。在這次會談中，美國意欲創造一個廣泛的議程，而分散焦點於其他議題上，如武器擴散、貿易爭議、人權議題等，但中國則是較為尖銳的集中於如何處理台灣議題。柯林頓表示，美國將繼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反對台獨但盼兩岸問題和平解決，對於中國，美國尋求的是接觸交往而不是孤立圍堵（Ross, 2000: 99-101）。但當江澤民再度要求柯林頓承諾拒絕日後台灣領導人訪美，柯林頓只是表示在未來對於台灣領導人的訪美，將是個案審查的（case by case），而且是非官方而罕見的（unofficial and rare），此外也必須是私人（private）的行程，符合這些條件才可能獲得批准（容安瀾，2007：132-133）。此次會談氣氛尚稱融洽，然在台灣問題上仍存有歧見，沒有達成任何具體協

議，故雙方決定 11 月在大阪召開亞太經合會之時，安排另一次高峰會，但日後柯林頓因府會預算危機未能出席，而由時任副總統的高爾（Al Gore）代表與江澤民會面，雙方仍是老調重談，各自闡述自己的立場。

柯江會後，美中關係似乎逐漸改善，但中國仍有後續既定的軍事演習，在國防部看來，中國持續進行軍演將會損害台海乃至於東亞的穩定，美國必須要對中國的危險行動提出一些警告。1995 年 11 月 14 日，時任國防部助理部長的奈伊在北京進行為期四日的訪問，奈伊表示對台灣使用任何武力都是嚴重的錯誤，他也提醒了中國，台灣關係法或是美國國家戰略安全報告均明確指出，任何影響台海穩定的因素都將被視為是對美國安全的威脅，而中國破壞穩定的行為將對雙方關係造成長遠的傷害（Garver, 1997: 85-86），當解放軍將領探詢美國將如何因應台海危機時，奈伊拒絕討論美國的應變計畫，只是重申了美國仍將信守台灣關係法，顯是希望繼續保持一貫戰略模糊的策略，以嚇阻中國可能進一步升級的軍事行為（林正義，2001：239）。

在此同時，中國在黃海持續進行大規模的軍演，引起美國參議院的強烈反彈，外交關係委員會東亞暨太平洋小組委員會於 1995 年 10 月 11 日及 12 日，舉行有關中國軍力成長及其角色（The Growth and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的聽證會。時任助理國務卿的羅德在證詞中表示，中國的軍事演習並沒有特別過份（particularly excessive），而在答覆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湯瑪斯（Craig Thomas）時又表示，中國的軍事演習尚未達到對台灣安全有立即且明顯威脅的地步，因此只有非正式與國會諮商，而沒有依台灣關係法向國會提出正式的報告（林正義，1998：159-160）。但行政部門的觀點並

未能完全說服國會，在 10 月下旬托里伽利 (Robert G. Torricelli) 與布朗 (Sherrod Brown) 兩位參議員共同發表聲明指出，總統應依據台灣關係法重新評估台灣在防衛上的需要，同時必須採取適合的行為 (王公龍，2005：40)，而 11 月間，中國再度展開海空實彈演習，加深了美國國會的關切，如參議員所羅門 (Gerald Solomon) 致函柯林頓，表達對於台海情勢的關注，柯林頓在回信中表示試射導彈與軍演的確使台海局勢越演越烈，但認為中國的意圖是借軍演向台灣和美國發出政治信號，並非將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因此沒有必要根據台灣關係法第三條第 C 項，與國會磋商以尋求適當的因應之道 (吳心伯，2004：54-55)。

國會的態度代表著國內的民意和輿論，對柯林頓政府形成了壓力，迫使柯林頓政府必須做出回應，不只是對國內政治有所交代，更要讓中國與台灣理解美國所定義的新現狀。承上所述，美國在中國第一波軍演前後，均是溫和以應，不斷釋出善意，期望中國能夠瞭解美國的兩岸政策，進而配合美國的亞太秩序，柯林頓給江澤民的信函與柯江高峰會，都是這種思維的展現。但中國領導階層顯然無法就此滿足，無論為了撫平中國內部的民族情緒，抑或是政治局內鷹派與鴿派聯手扮演黑白臉 (Scobell, 2000: 232-234)，在江澤民與美國高層互動頻繁之際，中國繼續展開更大規模的軍演，在中國看來，展現使用武力的意志是必要的，也認為不至於爆發武裝衝突。但在美國眼中，尤其是國會，並不能諒解何以在美中元首高峰會後，顯然已經向中國讓步，但中國仍執意持續軍演，甚至將演習規模擴大。

在這一階段中，柯林頓政府原本寄望柯江高峰會後，中國能夠接受美國定義的現狀安排，因而參考點已轉為美國期望的水準，這

個期望水準可以稱之為「美國合意的兩岸關係」，與先前的參考點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之前美國定義下的兩岸關係是由於國會介入，就核發簽證一事美國無法示弱，加上柯林頓政府疏於管理兩岸事務，只能強渡關山式的逼迫中國接受。在柯林頓政府內部檢討後，認清兩岸關係不能一憑己意而獨斷獨行，必須得到中國的認可（或至少是默許），因此，這裡的期望水準是美國希望能讓中國滿意，又不違背美國的利益。但中國陸續釋放出更具挑釁的軍事信號，柯林頓政府縱使理解中國的用意，仍必須對於國內的政治壓力，乃至於世界各國的注目（特別是亞太盟國的憂心）做出表示，時任國家安全顧問的雷克即認為中國領導人無視於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對於台灣的行動也沒有考慮到美國的立場，而美國對於中國一連串的軍演反應太過於軟弱（Suettinger, 2003: 247）。故此，在 1995 年 12 月 19 日，美國的尼米茲（Nimitz）航空母艦由日本出發前往波斯灣，途中以天候為理由穿越了台灣海峽，乃是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 17 年以來，美軍首次直接進入台灣海峽，其傳達給中國的信號不言而喻（Lee, 1999: 47-48）。平實而論，中國即便對於美國定義的現狀有意見，也只能透過軍演表達不滿，在全面接觸的基調底下，美國並無損失，尼米茲的台海巡航只能視作是與中國的軍事對話，試圖滿足各方對於美國的期待。<sup>16</sup>

---

16. 陸伯彬也認為尼米茲通過台灣並不是政治表態，也不是對中國領導人的警告，但他完全將此次巡航歸於天氣因素，亦見其謬誤之處，回溯當時的氣象資料，可以發現並沒有特別嚴重的因素足以使航空母艦必須通過台海，美國在此事上的目的絕非如所宣稱的那樣單純，參見 Ross（2000: 104）。



表二 美國的參考點及其行動 1995 年 10-12 月

觀 察 期	參考點 (領導者評 估的結果)	相對於參考點 的預期結果	領導者的 風險傾向	政策選擇
1995 年 10 月中旬，中國海軍於青島附近黃海海域舉行演習，這是一次多兵種的聯合演練	美國合意的 兩岸關係	獲利	風險趨避	· 元首高峰會 · 高級官員陸續進行交流訪問
1995 年 11 月中旬，中國在福建南方的東山島進行海空軍實彈演習(中國將部分戰機移駐距離台灣不到 250 海哩的基地)	美國合意的 兩岸關係	獲利	風險趨避	· 國防部高層進行訪問，並發表口頭警告。 · 釋放軍事信號，尼米茲巡航台海。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 (三) 1996 年 2-3 月

#### 1. 背景

1996 年 2 月中國在福建舉行軍事演習，由南京戰區指揮，集結約 15 萬名兵力。該年 3 月 5 日，新華社宣布自 3 月 8 日至 15 日在台海進行地對地飛彈演習，3 月 8 日清晨中國發射 3 枚東風十五型飛彈，第一枚落在高雄外海目標區，接著第二枚東風 15 導彈，落在基隆外海目標區。第三枚亦落在高雄外海目標區，五天後即 3 月 15 日又有一枚東風十五型飛彈命中高雄外海目標區。中國以飛彈夾擊台灣的南北兩大港，顯示態勢的緊張更甚 1995 年。此外，新華社在 3 月 9 日再度公告，自 3 月 12 日至 20 日中國解放軍海、空部隊在

東海及南海，大約是金門以南、澎湖西南海域進行第二次海、空實彈演習，但後來因天候不佳而作罷。3月15日新華社又宣布在3月18日到25日之間，中國解放軍將進行第三次陸海空聯合演習，地點約在平潭島附近，距離烏坵、莒光僅10海里。這幾次演習的軍事目的大致與1995年相似，不外乎是摧毀敵方指揮中心、海面對抗、登陸作戰等，而政治目的則是在於影響1996年台灣首次的總統民選，欲以武嚇阻撓中國眼中的台獨候選人當選（費學禮，1999：209-211；Garver, 1997: 99-100; Whiting, 2001: 122）。

## 2. 分析

1996年2月上旬，美國國防部成立監視台海情勢週報工作小組，檢討台海局勢。2月5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李肇星前往華府，與國務次卿塔諾夫展開會談，塔諾夫重申台灣關係法與台海情勢的關連性，表明破壞台海穩定後果嚴重，武力展示無助於和平（邵玉銘等，1999：35-37；Hickey, 1998: 407）。此時的參考點與1995年10-12月相同，柯林頓政府雖認知中國將持續軍演，仍希望中國會在雙方默契下放棄對台灣的軍事威脅，但類似的警告與會談顯然無濟於事，中國仍照計畫展開軍演。

該年3月5日中國宣布將舉行飛彈試射，白宮新聞秘書麥克瑞（Mike McCurry）立即表示，柯林頓總統深感美國應盡力使台海緊張情勢受到控制，他鼓勵台灣與中國和平對話，並認為中國的軍演是一種不顧後果的行動。3月8日中國發射三枚導彈後，麥克瑞對媒體強調，在八個月內進行第三次且更為接近台灣的導彈試射，是極具挑釁也很輕率（provocative and reckless）的行為（U. S. White House, 1996a; U. S. White House, 1996b），而在國務院方面，發言人伯恩斯（Nicholas Burns）在3月5日在例行記者會中表示，飛彈

試射用意是對台灣釋放訊息，他強調美國不同意中國所釋放的訊息，但美國亦不認為中國軍演代表急迫的威脅，不過有潛在的嚴重性；3 月 7 日伯恩斯又表示飛彈試射是不負責任的，美國已向中國政府申言，如果試射出差錯，亦即誤擊台灣，將會有嚴重後果，中國應節制進一步挑釁的行動（U. S. Department of State, 1996a;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1996b）。此時美國的態度雖漸趨強硬，但仍希望能透過外交途徑，協商解決台海危機，因而寄託在即將訪美的中國國務院外事辦主任劉華秋身上，盼以所謂的雙邊新戰略對話，表現美國堅定的立場。（邵培德，2000：26；吳心伯，2004：55；Thies and Bratton, 2004: 564）

1996 年 3 月 7 日，雷克邀請劉華秋晚宴，為了加強美國欲傳達的訊息，克里斯多福與國防部長裴利（William Perry）也加入了這次的晤談，裴利表示，中國的導彈演習是魯莽而富侵略性的（reckless and aggressive）行為，也是對美國利益的威脅。他並警告劉華秋美國絕對有能力捍衛在亞太地區的主要（vital）國家安全利益，並已經準備應付事態。劉華秋表示飛彈試射與隨後舉行的海空演習都是例行公事，美國不應過度表示，又表示這次危機導因於柯林頓政府核發李登輝簽證，責任在於美國，裴利則回應中國做出交叉射擊，即是確定射程，決不是單純的例行演習。他也和雷克嚴肅的表示中國若對台灣有任何軍事行動，將會產生嚴重的後果（grave consequence）（邵培德，2000：32-33；孟捷慕，1999：496-497；Swaine, 2001: 325）。這次的會晤代表著美國的最後通牒，外交上的折衝已不能使中國停止軍演，柯林頓政府將面臨著國內政治壓力升高與美國霸權威信下降的雙重威脅，顯示柯林頓政府正式進入危機決策的過程，故而，參考點也從長期的考量（美中關係與兩岸政策），轉入短期的思維

（美國的戰略與安全信譽），亦即面對中國在台海直接挑戰美國的威信，美國不能只靠言論宣示，必須有實質的作為，才能捍衛其國家利益與地位。

在決策過程中，柯林頓總統顯示了充分授權，在外事上他仰賴國安團隊，包括雷克、克里斯多福、裴利等人（Suettinger, 2006: 279-280），在 1996 年的台海危機中，亦是完全依靠團隊運作以因應危機。3 月 8 日中國展開第一次飛彈試射，參與危機決策的人員一致認為應該提高姿態，由於克里斯多福選擇不積極參與台海危機決策，雷克也因尊重體制而遲未能建立與中國的溝通管道，結果是由裴利主導決策，並由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夏利卡什維利（John M. Shalikashvili）將軍協助擬定作戰計畫（邵玉銘等，1999：60），會中決定派出獨立號航艦戰鬥群中的邦克山號（USS Bunker Kill）巡洋艦先赴台灣南部試射區域監測，獨立號（USS Independence）則在稍晚留駐在台灣東部外海觀測台灣北部演習區（林正義，2001：260），此外，裴利認為中國將採取第二波的軍演行動，美國若只派出一艘航空母艦不足以顯示使用武力的意志，因為獨立號本就部署在日本，故而決定再派遣第二艘航空母艦，但不進入演習的區域，一方面在於避免太過挑釁，另一方面又暗示只要中國的演習不再瞄準台灣，美國就會尊重中國為演習所劃定的禁制區（Suettinger, 2003: 247；邵培德，2000：36）。

另外在國會方面，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小組先於 1996 年 2 月 7 日召開「台灣安全：威脅及反應」（Taiwan's Security: Threats and Responses）聽證會，邀請助理國務卿羅德、國防部亞太事務副助卿坎柏（Kurt Campbell）等人作證，羅德認為在台海危機期間，美國宜保持模糊的態度，但可以確定中國對台灣並無立即的

軍事威脅。而在 3 月 14 日，中國已開始新一波的軍演，眾議院於是召開「台海危機：對美外交政策的意涵」(Crisis in the Taiwan Strait: Implications for U.S. Foreign Policy) 聽證會，其目的在於瞭解中國的軍演是否已對台灣的安全構成威脅，以及美國派遣加派尼米茲前往台海的用意，同樣由雷克與坎柏出席作證。坎柏表示美國在亞太地區有重要利益，因而會採取無限制 (open-ended) 的行動，而這次的派遣行動是謹慎預防的措施 (prudent precautionary measures)，顯示美國保衛國家利益的決心。羅德亦表示美國已向中國表達關切台灣安全，中國只是實施恐嚇以及心戰 (intimidation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其目的是藉由軍演影響台灣的選舉，並不對台灣的安全產生立即的威脅，因此也就沒有必要依台灣關係法向國會報告 (Goldstein and Schriver, 2001: 157-159; Bush, 2001: 188-189)。

但國會並不全然滿意柯林頓政府的危機處理，參眾兩院都通過非強制性的決議案，在不同程度上聲援台灣，<sup>17</sup> 試圖介入行政部門的決策，但代表國務院的羅德與國防部的坎柏之言論均試圖降低衝突升級的可能性，並極力避免國會以台灣關係法，甚至是戰爭權力法左右行政部門，讓事態更形複雜，這裡也可以看出柯林頓政府對於威脅的認知並不同於國會的觀點，這除了得到來自中國的保證(絕對不會進犯台灣)之外，也顯示柯林頓政府希望在雙方軍事表態後，能夠進行下一階段的危機處理。

在 3 月 12 到 20 日中國展開第二波演習開始前，裴利已離開美國赴智利訪問，11 日在訪問智利的行程中，裴利釋出增派第二艘航

---

17. 眾議院 1996 年 3 月 19 日以 369 票同意，14 票反對通過決議案 (H. Con. Res. 148)，強調如果台灣遭受中國入侵、飛彈攻擊或封鎖時，美國應軍事防衛台灣。3 月 21 日美國參議院以 97 票對零票通過決議案 (S. Con. Res. 43)，表明在日漸升高的中國軍事威脅下，總統應重估對台軍售。見林正義 (1998: 164、168)。

艦戰鬥群前往台灣海峽的訊息。裴利表示，尼米茲艦隊將於 3 月 23 日台灣總統大選前與獨立號航艦戰鬥群會合，兩個艦隊合計超過 140 架戰機，是自一九七五年越戰結束以來派遣在該區域最強大的艦隊，柯林頓政府雖可以排除中國全面入侵台灣的可能性，但不確定在接下來階段的軍演會出現何種狀況，因此必須有各種應戰計畫（林正義，2001：241）。中國於 3 月 18 日發布第三波更加接近台灣的演習，對台灣施加壓力。不過柯林頓政府在部署了兩個核母戰鬥群之後，認為其戰略上的可靠性已獲得保證，並未在武力使用上升級。3 月 23 日台灣完成首次總統大選，中國在 25 日宣布結束在台灣海峽北端為期八天的軍演，美國駐日本海軍當局隨後發表聲明表示，獨立號航艦戰鬥群將在 3 月 28 日回到日本橫須賀基地，尼米茲號航艦戰鬥群繼續在西太平洋執行例行任務，直到接到新命令為止。

這裡可以看出中國在軍演的後期逐漸出現收斂的跡象（如減少導彈發射數目），顯示中國已經感受到來自美國的強大壓力，美國已成功的達到其戰略目的—使中國更加謹慎行事，也維持了盟國對美國在亞洲的戰略信譽，故而，美國的參考點已轉向修補美中關係，陸續推動雙方互訪，以加強溝通（Bader, 2006: 8-9; 藍普頓，2003：42-44）。在這次危機中，美國深刻感受到台灣議題對於美中兩國的嚴重性，若不謹慎處理將會摧毀 1971 年以來的正常關係，甚至將引起亞太地區的動盪與不安，因此在危機過後，美國也展開了兩岸政策的檢討（特別是對台政策上），乃至於有日後柯林頓在上海宣布的新三不，也讓繼任的小布希政府重新評估中國的角色。

表三 美國的參考點及行動 1996 年 2-3 月

觀察期	參考點 (領導者評估的結果)	相對於參考點的預期結果	領導者的 風險傾向	政策選擇
1996 年 2 月中國在福建舉行軍事演習(至 3 月初已集結約 15 萬名兵力)	美國合意的兩岸關係	獲利-損失	風險趨避	· 進行最後的外交折衝。
1996 年 3 月 8-15 日中國宣布將向東海及南海進行地對地東風 15 型導彈發射訓練(3 月 8 日發射第一枚,落在高雄外海目標區;第二枚落在基隆外海目標區;第三枚落在高雄外海目標區)	美國的戰略與安全信譽	損失	風險承受	· 獨立號航母至台灣東部海面監控情勢。
1996 年 3 月 12-20 日間,中國解放軍海、空部隊在東海與南海展開第二次實彈軍事演習。	美國的戰略與安全信譽	損失	風險承受	· 尼米茲號航母趕至台灣附近海域與獨立號會合。
1996 年 3 月 18-25 日間,中國解放軍在台灣海峽展開第三次陸海空聯合演習。	美中雙邊關係	獲利	風險規避	· 著手修補美中關係,推動雙方互訪。 · 檢討兩岸政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 五、結語

世局正邁入後美國的時代，中美關係相較於過去十餘年更為複雜。美國從冷戰時期即運用中國牌平衡蘇聯的力量，而蘇聯解體後，

美國也在等著最後一個共產大國的消逝。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一個轉捩點，但帶來的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垮台，而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聲。鄧小平理論的成功讓世界情勢有了新的變化，中國不只是成為小羅斯福在 20 世紀初即預言的軍事大國，在經濟上的成長更讓各國震驚，逐漸成為世界級的強權，一個美國眼中的戰略競爭者。

這樣的發展改變了世界政治的樣貌，也將會制約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對外行為，札卡利亞（Fareed Zakaria）即指出當今美國與中國之間存在著一種全球化下的相互保證毀滅，不僅是核武上的對峙，而是在經濟上強烈的相互依存關係：中國需要美國的市場來販賣大量中國製造的商品，中國對美國享有鉅額的出超，而美國有大量的國債掌握在中國手中，在某種程度上掌握了美國的政經命脈（Zakaria, 2008: 124），因此，美中之間的關係已不若 1995-96 年台海危機時的單純。就風險平衡理論觀之，美國的參考點除了過去的人權、貿易、亞太安全等外，現在更多了相互依存與中國再興的變數，顯示美國必須更慎重處理台灣議題，易言之，一旦美中再度為台灣爆發衝突，美國是否會再度派出強大的軍力協防台灣，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問題。

即便如此，透過風險平衡理論的研究，能讓我們更深入的瞭解美國的決策模式，最重要的步驟就是找出參考點。就長期而言，美國關注的優先性絕對是所謂的 A 類問題，亦即美國在重要的區域中，為了對抗具敵意的霸權崛起，將會扮演穩定者與擔保者的角色（Nye, 1999: 29），在美國霸權尚未結束前，這仍應屬美國戰略制定者的最高原則，落實在美國對兩岸的亞太戰略中，可以看出美國的目的便是讓中國意識到對台使用武力不應該是其選項（Rice, 2000: 52）。理解了美國全球戰略與國家利益的基本參考點，有助於日後



決策者與研究者判讀美國在危機時刻的取捨動向，更能協助分辨其言行背後的真實意義。

## 參考書目

- Allais, Maurice. 2008. "Allais paradox." in [http://www. dictionaryofeconomics. com/article?id=pde2008\\_A000074&q=allais&topicid=&result\\_number=1](http://www.dictionaryofeconomics.com/article?id=pde2008_A000074&q=allais&topicid=&result_number=1). Latest update 14 December 2008.
- Allison, Graham T. 1971.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 Allison, Graham T. and Philip D. Zelikow. 1999.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2nd. ed. New York: Longman.
- Arkes, Hal R. and Catherine Blumer. 1985. "The Psychology of Sunk Cost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35, 1: 124-140.
- Bader, Jeffrey. 2006. "The Taiwan Strait Tensions of 1995-96: The View of an American Former Official." in King-Yuh Chang. ed. *The 1996 Strait Crisis: Decisions, Lessons and Prospects*: 1-16. Taipei, Taiwan: Foundation on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Studies.
- Bendor, Jonathan and Thomas Hammond. 1992. "Rethinking Allison's Model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 2: 301-322.
- Berejikian, Jeffrey. 2004.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der Risk: Framing State Choi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1981. "An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4, 4: 917-931.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1988. "The Contribution of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8, 4: 629-652.

Bush, Richard C. 2001. "Taiwan Policy Making since Tiananmen: Navigating through Shifting Waters." in Ramon H. Myers. ed. *Making China Policy: Lessons from the Bush and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179-199.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Cashman, Greg and Leonard Robinson. 2007.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auses of War: Patterns of Interstate Conflict from World War I to Iraq*.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Cutler, David M. et al. 1991. "Speculative Dynam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8, 3: 529-546.

De Bondt, Werner F. M. and Richard Thaler. 1985. "Does the Stock Market Overreact? : Discussion." *Journal of Finance* 40, 3: 793-805.

Farnham, Barbara. 1992. "Roosevelt and the Munich Crisis: Insights from Prospect Theory." *Political Psychology* 13, 2: 205-235.

Fravel, M. Taylor. 2007/08. "Power Shifts and Escalation: Explaining China's Use of Force in Territorial Dispu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2, 3: 44-83.

Garver, John W. 1997. *Face of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Goldstein, Avery. 2005.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ldstein, Steven M. and Randall Schriver. 2001. "An Uncertain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Taiwan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China Quarterly* 165: 147-172.
- Haas, Mark L. 2001. "Prospect Theory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5, 2: 241-270.
- Hartley, Roger and Lisa Farrell. 2002. "Can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Explain Gambling?"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 3: 613-624.
- Hickey, Dennis Van Vranken. 1998.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of 1996: Implications for U.S. Security Poli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7, 19: 405 – 419.
- Jervis, Robert. 1992.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Loss Avers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13, 2: 187-204.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2003.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 4: 5-56.
- Kahneman, Daniel and Amos Tversky.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 2: 263-291.
- Kahneman, Daniel et al. 1991. "Anomalies: The Endowment Effect, Loss Aversion, and Status Quo Bia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 1: 193-206.
- Kang, David C. 2007.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anner, Michael D. 2004. "Framing and the Role of the Second Actor: An Implication of Prospect Theory to Bargaining." *Political Psychology* 25, 2: 213-239.
- Lee, Bernice. 1999. *The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Taiw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 Levy, Jack. 1992. "Prospec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etical Applications and Analytical Problems." *Political Psychology* 13, 2: 283-310.
- Levy, Jack. 2003. "Applications of Prospect Theory to Political Science." *Synthese* 135, 2: 215-241.
- Lin, Cheng-Yi. 1996. "The U.S. Factor in the 1958 and 1996 Taiwan Strait Crises." *Issues and Studies* 32, 12: 14-32.
- McDermott, Rose. 1998. *Risk-tak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ospect The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McDermott, Rose. 2004. "Prospect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Gains and Losses from the First Decade." *Political Psychology* 25, 2: 289-312.
- Mercer, Jonathan. 2005. "Prospect The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8: 1-21.
- Nye, Joseph S., Jr. 1999. "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78, 4: 22-35.
- Rice, Condoleezza. 2000.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79, 1: 45-62.

- Ross, Robert S. 2000. "The 1995-96 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 Coercion, Credibility, and the Use of For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2: 87-123.
- Ross, Robert S. 2002. "Navigation the Taiwan Strait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 2: 48-85.
- Savage, Leonard J. 1954. *The Foundations of Statistics*. New York: Wiley.
- Savage, Leonard J. 1972. *The Foundations of Statistics*. 2nd rev. ed.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 Schaubroeck, John and Elaine Davis. 1994. "Prospect Theory Predictions when Escalation is not the Only Chance to Recover Sunk Cost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57, 1: 59-82.
- Scobell, Andrew. 2000. "Show of Force: Chinese Soldiers, Statesmen, and the 1995-96 Taiwan Strait Crisi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5: 227-246.
- Shiller, Robert J. 1979. "The Volatility of Long Term Interest Rates and Expectations Models of the Term Structu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7, 6: 1190-1219.
- Suettinger, Robert L. 2003. *Beyond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Suettinger, Robert L. 2006. "U.S. 'Management' of Three Taiwan Strait Crises." in Michael D. Swaine. ed. *Managing Sino-American Crises: Case Studies and Analysis*: 251-292.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Sutter, Robert G. 2005. *China's Rise in Asia: Promises and Peril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Swaine, Michael D. 2001. "Chinese Decision-Making Regarding Taiwan, 1979-2000." 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1978-2000*: 289-336.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aliaferro, Jeffrey W. 2000/01.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3 (winter): 128-161.

Taliaferro, Jeffrey W. 2004. *Balancing Risks: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hies, Wallace and Patrick Bratton. 2004. "When Governments Collide in the Taiwan Strait."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7, 4: 556-584.

Tucker, Nancy B. 2005. *Dangerous Strait: The U.S.-Taiwan-China Crisis*.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versky, Amos and Daniel Kahneman. 1986. "Rational Choice and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59, 4: 251-278.

Tyler, Patrick E. 1996. "As China Threatens Taiwan, It Makes Sure U.S. Listens." *The New York Times* 24 January 1996 in <http://query.nytimes.com/gst/fullpage.html?res=9B01EEDC1F39F937A15752C0A960958260>. Latest update 27 March 2009.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1996a. "Department of State Daily Press Briefing, March 5, 1996." in <http://dosfan.lib.uic.edu/ERC/briefing/>

- daily\_briefings/1996/9603/960305db.html. Latest update 27 March 2009.
-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1996b.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Daily Press Briefing, March 7, 1996." in [http://dosfan.lib.uic.edu/ERC/briefing/daily\\_briefings/1996/9603/960307db.html](http://dosfan.lib.uic.edu/ERC/briefing/daily_briefings/1996/9603/960307db.html). Latest update 27 March 2009.
- U. S. White House. 1996a. "White House Press Briefing March 5, 1996." in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48753>. Latest update 27 March 2009.
- U. S. White House. 1996b. "White House Press Briefing, March 7, 1996." in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48755>. Latest update 27 March 2009.
- Whiting, Allen S. 2001. "China's Use of Force, 1950-96, and Taiw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6, 2: 103-131.
- Zakaria, Fareed. 2008. *The Post-American World*.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
- 王公龍。2005。〈危機決策模式的選擇性應用—以 1995-1996 年台海危機期間克林頓政府的決策過程為例〉。《上海行政學院學報》5：36-45。
- 吳心伯。2004。〈反應與調整：1996 年台海危機與美國對台政策〉。《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54-60。
- 孟捷慕（James H. Mann）。1999。林添貴譯《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密》。台北：先覺。
- 林民旺。2007。〈國際關係的前景理論〉。《國際政治科學》4：104-126。



- 林正義。1998。〈1995-1996 台海危機：美國國會的反應〉。林正義編《中美關係專題研究：1995-1997》：145-184。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林正義。2001。〈美國出兵台灣海峽及其限制〉。裘兆琳編《後冷戰時期美國海外出兵案例研究》：229-272。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林正義。2002。〈美國與中共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及其對台灣的影響〉。裘兆琳編《中美關係專題研究：1998-2000》：1-36。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林正義。2007。〈戰略模糊、戰略明確或雙重明確：美國預防台海危機的政策辯論〉。《遠景基金會季刊》8，1：1-51。
- 邵玉銘等。1999。《美國介入台海危機決策過程之研究》。台北：政大國關中心。
- 邵培德（Patrick Tyler）。2000。聯合報編譯組譯《中美交鋒》。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威廉紐曼（William W. Newmann）。2007。余瓊瑤等譯《美國總統與國安決策過程》。台北：國防部部長辦公室。
- 容安瀾（Alan D. Romberg）。2007。賈宗宜、武文巧譯《懸崖勒馬：美國對台政策與中美關係》。北京：新華出版社。
- 袁易等編。2004。《中國崛起之再省思：現實與認知》。台北：政大國關中心。
- 陳一新。2000。〈柯林頓政府台海危機決策制訂過程—個案研究〉。《遠景季刊》1，1：87-138。
- 陳文賢。2002。《柯林頓及布希政府的中、台政策：決策小組的研究途徑》。台北：一橋出版。

費學禮 (Richard D. Fisher Jr.)。1999。〈中國飛彈飛越台灣海峽的政治與軍事評估〉。李潔明等譯《台灣有沒有明天?: 台海危機美中台關係揭密》: 204-246。台北: 先覺。

裘兆琳。1998。〈1995-1996 台海危機: 華府、北京與台北之決策失誤檢討〉。林正義編《中美關係專題研究: 1995-1997》: 99-144。台北: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蔡榮祥。2007。〈一觸即發或虛張聲勢: 論一九九五、一九九六台海危機〉。《台灣政治學刊》11, 1: 201-239。

藍普頓 (David M. Lampton)。2003。計秋楓譯《同床異夢: 處理1989至2000年之中美外交》。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

# **Irrational Balancing? —The Review of the U.S. Military Intervention during the 1995-96 Taiwan Strait Crisis**

Lucian T. H. Hsu \*

Most 1995-96 Taiwan Strait crisis studies developed thus far are based on the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Its axiom is that the state is like a rational actor seeking to maximize profit. Taiwan, however, is an asymmetric interest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e military intervention of the U.S. to the Taiwan Strait during the 1995-96 is not the best means towards profit maximization. More importantly, the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is used to underst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it fail to expla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hus, neoclassical realist Jeffrey W. Taliaferro developed the Balance of Risk theory explain why the great powers initiate risky military or diplomatic commitments in the peripheral regions. These peripheral regions usually do not factor into the core interests of the great powers. This goes to show how the action of the great powers do not always accord with the rational principle.

---

\*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Strategic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Hence, this study is to review the U.S. military intervention during 1995-96 using Taliaferro's theory to provide better perspectives.

**Key words:** balance of risk, U.S.-PRC relationsexpected utility theory, neoclassic realism